

Q. M. Lee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

談小說“青春之歌”

王永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11)

談小說“青春之歌”

王永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11)

談小說“青春之歌”

王永生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C94号

上海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

*

书号 0118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1/18 字数 29,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定价(5) 0.13元

“讀書运动輔導叢書”編輯凡例

(一) 全國各地區都開展了“多讀好書、多讀反映現實的作品”的運動，這套輔導叢書，就是想為配合運動的開展盡一分力量。

(二) “輔導叢書”中所分析評介的作品，以各地讀書運動中所普遍推薦的書目為主。

(三) 輔導文章，要求深入淺出地從政治上和藝術上來幫助青年讀者理解和欣賞文學作品，並從這些作品中汲取思想力量，學習書中英雄人物的高貴品質。

(四) “輔導叢書”一般是每本分析評介一部文學作品，但必要時，亦可綜合輔導幾部文學作品或包括幾篇輔導文章。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一	从“認識过去”談起	1
二	林道靜的生活道路	9
三	坚强的战士——盧嘉川与江華	20
四	走着不同道路的知識分子形象	29
五	小說的藝術特色	45

一 从“認識过去”談起

史学工作者在辛勤地帮助人們認識昨天，認識昨天人們的生活，認識人們的祖先和父兄如何向社會、向大自然斗争過來的道路，認識這些，可以更好地認識今天，從而更清晰地展望明天。文学工作者也有着这样一个任务。負擔着同样的任务，但是帮助人們認識過去的方法、手段、途徑却不相同。史学工作者，从大量的史料中分析、綜合、總結出某一歷史現象發生發展的原因，找尋出各种各样的規律，以条理分明的論述向人們進行介紹。文学工作者也不斷地从大量的歷史現象中認清其發生發展的規律，然而，文学工作者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以生活本來的面貌，集中而概括地將现实生活再現于人們眼前。

我國歷史上曾經發生过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义运动，关于歷次農民起义运动發生与發展等各方面問題的探討，史学工作者不斷進行着努力，使人們从他們的劳动成果里獲得不少的教益。文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不少出色的貢獻，施耐庵以他的長篇文学巨著“水滸”，具体地生动地向人們提供了“官逼民反”的農民起义斗争画

卷，从百余梁山好汉的一系列英雄業績里鮮明地讓人們領略了古代農民革命領袖的英雄面貌，一覽无遺地在人們眼前繪出了殘暴的封建統治者所長期帶給人民的深重灾难。

人們不僅要求史学工作者以辛勤的劳动帮助人們了解过去，而且往往如飢如渴地热望文学工作者提供大量的藝術巨著。經驗使人們懂得，从文学工作者所精心塑造的藝術形象里，人們不但懂得了不少世事，而且更主要的，还从栩栩如生的无数英雄人物身上，从鮮明具体的一系列人物所走过來的各种道路当中汲取了精神力量。

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向文学工作者不断地提出要求：應該更多地創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創造歷史的人民的藝術作品。英雄輩出的当代蓬勃發展的现实生活需要文学工作者們以辛勤的藝術劳动來作及时的反映，近百年來为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民族解放、爭取民族独立而流血斗争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史实也需要文学工作者們支付巨大的劳动。

建國以來，文学工作者們在党的正确領導下，确实沒有辜負时代与人民的期望，出色地向祖國的文学宝庫輸送了大量的思想水平、藝術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前人的优秀作品，特別是近一年來，單就長篇小說的創作來說，卓越的成功之作就举不勝举。

僅以著名的“一二·九”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为例，这一

在党領導下的声势浩大的青年愛國运动，过去就很少能在文学領域里獲得正确、出色的反映，我國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革命知識分子奋勇向前的精神面貌与英雄气概，很少能得到藝術的表現，人們常常对此感到不能滿足。在1958年初，文学創作上却獲得了初步的然而可喜的收獲，楊沫同志經過前后六年時間的辛勤劳动，在他的小說“青春之歌”里，生动地具体地再現了这一歷史时期愛國青年頑强不屈地向黑暗統治势力艰苦斗争的生活面貌。

具有光荣斗争傳統的中國革命青年，从五四运动起就举起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紅旗，長时期以來，在党的教育与培养下，奋勇地向國內外敌人進行着不屈不撓的斗争，在黑暗的白色恐怖下追求着光明。无数先進的愛國青年團結在党的周圍，形成了强大的左翼战綫，經歷了多次的革命高潮与低潮；不少青年知識分子鍛煉成为党的忠实兒女。1930年前后，由于“左”傾路綫的錯誤，各个左翼团体曾一度遭到嚴重破坏，革命形势曾趋于低潮，但是，“九·一八”的一声炮响，喚醒了愛國的人民，激起了全國青年愛國运动的高潮，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南下示威，推动了无数愛國青年直接走上抗日前綫。就在日本帝國主义層層深入地侵略着祖國的領土，就在民族存亡系于一髮的时候，國民黨反动政府却实行着所謂“安內而后攘外”的賣國政策；一方面奴顏婢膝地对帝國主义的侵略毫不抵抗，一方面却阻止愛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对工農群

众、对爱国青年实行着血腥的统治和压迫。在敌人的監獄里，在敌人的皮鞭刺刀下，虽有少数的軟骨头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但是，这却鎮懾不了广大爱国青年的革命意志，坚强的更坚强了，无数青年坚定不移地奔向了革命大道。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進逼華北，人民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在党的号召、組織与領導下，北京的爱国青年煽起了“一二·九”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运动。

小說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东北淪陷的事变寫起，以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为主，歷史地真实地反映了直至 1935 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前后的中國社会这一急剧动荡的时代側面。

人們都清楚地記得，自从 1927 年“七·一五”武漢方面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緊跟着蔣介石的叛变而公开地叛变革命以后不久，就發生了所謂“宁漢合作”、“蔣汪合流”，国民党反动集团就以蔣介石为中心，在中國建立起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动統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最殘酷最黑暗的統治。大批的共產黨員、工農群众、革命青年遭到慘无人道的野蛮殺戮。反动家伙們所叫囂的口号是“宁可枉殺千人，不可走漏一个”，僅只 1927 年至 1929 年的兩三年中，就有四十五万个革命志士遭到反动統治者的殺害。但是，“中國共產党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从地下爬起來，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战斗了。他們

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保存了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① 经过 1927 年的南昌“八·一”起义，十二月广州起义，以及毛澤东同志所領導的湘贛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崗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毛澤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們在反革命的黑暗恐怖籠罩着全國的时候，帶領着全党同志和工農大众，找到了進行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擴大鄉村革命根据地，在長时期中以鄉村包圍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以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斗争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了 1930 年秋天，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五十个之多，在斗争中建立起來的紅軍就有十三个軍，共六、七万人；到 1931 年，紅軍人数更發展到十万人以上。1931 年 1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会，創立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选出毛澤东同志为主席。从此，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領導下克服了各种困难而逐漸壯大了。

1927 年以后，在國民黨反动統治集團內部，经过几年的軍閥混战，各派統治階級为了爭权夺利搞得四分五裂。由于混战，更使广大人民遭受顛沛流离、家破人亡的浩劫。人民革命政权的發展，使蔣介石反动集团感到極

① “毛澤东选集”，第 3 卷，1058 頁。

度的恐慌，从1930年冬天开始，便糾合几倍于革命部隊的兵力，一次次發動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圍攻。三次“圍剿”的消極結果，在1931年，發生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海盜的鉄蹄乘机踐踏了我國东北的領土，又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國主义闖進了上海。全國人民对于國民黨反动集团的“安内而后攘外”賣國政策表示了莫大的憤慨，紛紛要求“停止內战，一致抗日”。九月二十二日，党与工農紅軍提出了一致抗日的号召：“組織群众，反抗日本帝國主义的侵略……組織东北游击隊，直接予日本帝國主义以打击。”可是，反动集团头子蔣介石却拒絕了这一号召，繼續向主張抗日最積極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圍攻，積極准备着第四次的反革命“圍剿”。

面对这样的情况，全國人民怒吼起來了，到处掀起了要求抗日的群众性运动，上海十万大中学生罢課，接着上海三万多碼頭工人罢工。十月初，上海更有八十万工人推派代表到南京要求反动政府發槍抗日。可是，國民黨反动統治团集却一直死抱住“不抵抗”政策，毫不理睬并積極阻止人民的抗日要求。从此，人們再也忍耐不住了，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上海的学生聚集在南京的反动政府門前，抗議政府的賣國政策。但就在当晚，上海的七千多学生却被反动政府强迫用專車押回上海。斗争，人民要求抗日的正义斗争，絕不会因反动政府的蛮横措施而吓得停止，相反，斗争在全國範圍內更是風起云涌地展开了。十

一月里，更大規模的平津學生的請願隊伍，經過艱苦奮鬥又到了南京。可是，蔣介石卻用屠殺回答了學生們的正義要求，十二月十七日，當三萬學生聯合向國民党中央黨部請願時，反动軍警吹着沖鋒號，殺氣騰騰地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隊伍沖擊。當場不少愛國青年負傷了、犧牲了，被捕了的更不知其數。第二天，反动軍警又包圍了各地學生宿舍，把愛國青年一個個押上火車強迫送回平津。

小說就是从“九·一八”的一声炮响來開始人物的主要活動的。這時具有愛國正義感的女主人公林道靜从由個人坎坷不幸遭遇所处的麻木精神狀態中驚醒了過來，積極投入了抗日的宣傳活動。接着小說更着力描叙了北京大學南下示威團在南京所進行的示威請願活動，從而層次分明地展示了廣大愛國青年與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抗日救亡運動的漸趨高漲的形勢。

蔣介石反动統治集團並沒有因為全國人民的反對而改變其賣國政策，甚至在1933年3月，蔣介石還親自到河北制止國民黨軍隊對日寇的抵抗，對於請求抗日的部隊甚至下命令說：“有言抗日者殺無赦。”抗日反而有罪，真是典型的賣國口吻。在1932年6月開始了對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以後，又在1933年10月發動了規模更大的第五次圍攻。一方面向日寇奴顏婢膝地“奉獻”了一大塊一大塊祖國的領土，一方面又積極地配合日寇向革命根據地心臟進行猖狂的進攻。

与此同时，反动統治集团又在文化上加緊对左翼文化战綫的“圍剿”，无数刊物被禁止發行，无数書店被搜查封閉，无数作家被逮捕殺害。可是，反动統治集团的軍事圍攻与文化圍攻都慘遭失敗了。“作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东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發。而作为这两种‘圍剿’之共同結果的东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①

反动統治集团的賣國政策执行的結果，一个“塘沽协定”(1933年5月)，承認了日寇对东三省的“合法”占領，丟掉了热河，并使整个華北讓給日寇控制。一个“何梅协定”(1933年6月)，河北、察哈尔兩省的主权又大部喪失。接着在1935年11月，蔣介石为了討好日寇又出賣了整个華北，設立所謂冀察政务委员会，使華北完全处于“特殊化”。

整个華北的淪亡，使全國各階層人民感到亡國滅種的大禍已迫在眉睫，到处發出救亡圖存的沉痛呼声。在中國共產党著名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的号召下，在刘少奇等共產党人的領導下，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青年愛國运动爆發了。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一万余人不顧敌人槍彈刺刀的威脅，在國民黨軍警的皮鞭、棍棒、水龍阻击下勇猛前進，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674頁。

主义”“停止內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一二·一六”正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青年学生在党的正确領導下，又举行了規模更大的示威。三万多学生手挽手組成了五路游行大隊，高呼“反对華北自治，爭取民族解放”等口号，沿途市民也紛紛参加了示威的行列。从早晨三时起一直到夜晚十时，游行的隊伍赤手空拳地为挽救危急的祖國整整搏斗了一天，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群众威力下不得不宣布延期。从此，全國的抗日救亡运动更涌起了新的高潮。

小說就在这“一二·一六”的游行隊伍奋勇前進的宏偉画面里結束了一系列人物的全部活动。小說深入地反映了这大动蕩时代中各种知識分子的面貌与变化，勝利地完成了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藝術使命。作者的筆墨虽然只集中地描繪了大动蕩时代中知識分子階層的形形色色面貌，但由于小說通过丰富多彩的藝術形象反映了深刻的社会面貌的本質，因而給历史刻下了鮮明具体的面影，給人們提供了“認識过去”、“認識生活”、“認識自己”的極為生动的“教科書”。

二 林道靜的生活道路

小說“青春之歌”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靜从尋求个人出路到自觉地参加革命、从苦悶彷徨的青年鍛煉成为坚强

的共產主義戰士的成長過程，展開了整個小說曲折、生動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在白色恐怖下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演變與生活道路的不同發展方向，反映了在黨的耐心教育與培養下青年一代的成長，讓人們具體地看到了青年一代的青春在黨的指引下、在共產主義的光輝照耀下所放射出的燦爛奪目的光芒。

小說作者以對人物精神面貌細緻刻劃的卓越才能，出色地描述了林道靜的曲折生活道路，令人信服地刻劃了有明顯軌跡可尋的性格發展過程，在人們的記憶里留下了鮮明難忘的逐步成長的女布爾什維克的光輝形象。

林道靜生長在一個只知吃喝玩樂的封建家庭里，父親是一個挂着大學士、大學校長、慈幼院院長等等教育家、慈善家偽善招牌的大地主，從她能夠懂得世事開始，就沒有見過母親一面。她那聰明、能干、純朴的貧農母親給披着人皮的野獸玩弄慘了以後，只在世上活了二十一個年頭，就被迫結束了年輕的生命。活着的凶殘潑辣的“母親”，只知道榮華富貴，只想在別人身上撈來一點什麼。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她得不到一絲一毫的真正溫暖，環境只使她養成了“乖僻”、“孤獨”、“執拗”、“倔強”的可貴的反抗性格，同父異母的弟弟與她在家庭當中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她見了，也“不哭，不求饒，沒有一滴眼淚從她倔強的眼睛里流出來”。進了中學以後，更變得“不愛講話，不愛笑，不愛理人”了。當那濺着唾沫星子的

“父母”为了她的升学爭論着“掙錢發財”时，十二歲的她，竟厭惡地睜睜笑眯了眼睛的无聊家伙，“眼眶里浮着泪珠，一言沒發”，便头也不同地“坐着洋車走了”！

本着这样执拗的孤僻性格，林道靜終年打扮得像个护士：白旗袍，白綫襪，白运动鞋，手里还經常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絹。当她滿怀着希望，离开黑暗的家庭，走向新的生活时，迎接她的却是更加黑暗的一切，生活里有着和她母親同样命运的跳海的可憐漁妇，生活里有着和她父親同样庸俗討厭的米蛀虫，那伙花花公子竟朝着她發出“給我捶捶腿”的无聊話語。当那“瘦削的黃蜡般”臉孔的漁妇抱着嬰兒跳海的消息傳到她耳边时，她覺得“脚步發軟，心头梗塞”。当那伙公子哥兒的嘻嘻哈哈的刺耳笑声傳到她耳边时，她被激怒了。她“挺直身子，筆直地朝这些人走了过去。……她咬着嘴唇，凜然地瞪視着这些人。她那傲慢的、仇視的眼光……瞪着他們足有一分鐘，然后庄重地轉过身來，不慌不忙地走开了”。可是，“剛走了几步，背后又傳來了刺耳的笑声”，她“沒有再回头……掏出手絹，狠狠地擦去了涌流出來的泪水”，她的心也隨着“狂怒而墨黑”的海洋而“變得更加陰暗”了。回到住处，却又發覺“滿臉含笑”的小學校長余敬唐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坏蛋，她“像受了重伤”似的，“蜷伏在板床上”。“大雨在窗外傾瀉”，海濤在“驚人地吼叫”，但是她什么也沒有听到似的，半个月以來的遭遇使她痛苦地感到：“人生为什么

是这样冷酷、殘暴？”“剛剛逃出了那个要扼殺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籠，想不到接着又走進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張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会。”她沉痛地發出了这样的疑問：“天地如此之大，难道竟連一个十八歲的女孩子的立錐之地都沒有？”終于，“一个意念可怕地閃过心头”，她“狂奔着跑出了屋外”，“縱身扑向了怪嘯着的狂滔巨浪”。

小說作者以細膩的筆触，包含着深厚的感情，委婉地寫出了女主人公家庭、社会的辛酸遭遇，使人們一接触小說，就为那女主人公的坎坷境遇与不幸命运而勾起无比的同情与关心。

余永澤在海边及时救了她，要她留在楊庄小学工作，倔强的她立即表示：“宁可餓死，也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在她“柔美虛弱的外形里，却隱藏着一个多么剛强，多么执拗的灵魂呀”！夙此，“微起漣波的平靜的大海”、“沙灘上各色美丽的貝壳”与那“南胡、簫笛”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虽然在余永澤的劝說与安排下，她同意了留在楊庄工作，可是，一貫天真热情的她却終日“充滿了悲天憫人和郁郁寡欢的情緒”。

一直到“九·一八”的炮声响了，才使她“驚醒了麻木、衰頹的心”。这时候，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見了一位年輕的地下黨員盧嘉川，林道靜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談吐和瀟灑不羈的風度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她立即感到：在生活里，有与余永澤“大不相同”的青年，“余永

澤談的只是些美麗的藝術和動人的纏綿的故事，可是盧嘉川却熟悉國家的事情，侃侃談出的都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短短的一席交談，她却“頓開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從此，抗日愛國的話語便不斷地出現在她的課堂里，“和學生的關係，好像忽然親密起來，她自己空虛的心靈也似乎充實起來了”。

沒有等到放寒假，在烏煙瘴氣的楊莊小學里實在呆不下去了，她“穿着單薄的衣服，帶着小小的行李卷”，“又悄然從北戴河逃回了北平”。可是，在北平這麼大的城市里，連一個小小的職業也找尋不到，“東碰西碰，東找西找。半个月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却連所謂職業的影子也沒有”。這時候，余永澤再三地向她提出同居的要求，雖然林道靜對他這一“乘人之危”的舉動表示了莫大的惱怒，對余永澤所謂“命運”支配一切的理論表示了極大的不滿，甚至由於這些言行，而感到余永澤原來是個“並不漂亮也並不英俊的男子”，然而，她畢竟是個“初戀的少女”，在那些“迷人”的“我愛你，永遠永遠地愛你”的話語前面，在那狹隘的報答救命之恩的情感支配下，終於不顧好友王曉燕的忠告，而答應了與余永澤同居的要求。

林道靜的生活道路確實是曲折的。從此，作者的筆又把年輕的女主人公帶進了另外一種天地。與余永澤同居了，整天便生活在“刷鍋、洗碗、買菜做飯、洗衣、縫補等

瑣細的家務”里，連“海闊天空遙望將來的夢想也漸漸衰褪下去”。可是，沒有多久，卻又“慢慢地被現實的鞭子從幻覺中抽醒來了”。余永澤對待生活、對待老佃戶、對待前途的態度使她痛苦地感到：他並不像“原來所想的那么美好，他那騎士兼詩人的超人的風度在時間面前已漸漸全部消失，他原來是個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瑣碎生活的男子”。雖然依旧生活在一起，可是彼此却像“一個陌生的人”。

又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林道靜在白莉萃所主持的“流浪者”除夕宴會上再一次遇到了久已敬仰的盧嘉川。盧嘉川、羅大方、許寧等人沸騰似的談話，“好像甘雨落在干枯的禾苗上”似的，她那“空虛的、窒息的心田”立刻“激蕩起一種從未有過的热情。她渴望和這些人融和在一起”。她像許寧等人一樣開始親切地稱呼盧嘉川為“盧兄”，一席誠懇的不知疲倦的個別交談，像是“給她的心灵開了一個竅門”似的，“每一句問話或者每一句簡單的解釋”都使她懂得了好多道理。和沸騰的热情的人們生活在一起，林道靜“竟有點不願和他們分別了”。回到了“冷清清”的余永澤居處，“一種沉痛的感覺攫住了她的心”，活生生的事例，使她深深地感到：“他（余永澤）和他們一比……呵，我，我多么不幸！”

作者筆下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從此又經歷了翻天覆地似的變化，“沉默寡言、常常憂郁不安的她，現在忽然

坐在門邊哼唧唧地唱着，好像一個活潑潑的小女孩”，那雙“明亮得像秋天的湖水”的眼睛里“彷彿蕩漾着迷人的幸福的光輝”。從此，“她那似乎黯淡下去的青春的生命复活了”，“好像有多少精力施展不出來似的成天忙碌着”。由于与進步青年的接触，由于与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接触，逐漸，在她的內心燃燒起愈趨高漲的革命火焰，与余永澤在感情上的裂痕也“随着她对于新生活的奔赴”在“日益加深”着，余永澤想阻止她参加愛國的游行活动，可是任何言辞也說服不了她堅定的意志。她以鋼鐵般的声音回答說：“如果我錯了，我自己負責！如果因为这个我变坏了或死了，我誰也不怨！”参加了游行集会，思想上的收穫实在太大了，眼前的一切使她感到：“好像突然長了翅膀，飛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新的生活使她迫切地向往着，革命的战友使她从欽佩、愛慕而產生渴望見面的情感，“她所愛的那个余永澤早已不存在了”；“曾經敬仰、曾經熱愛”过的那个余永澤在她眼里“已經变得多么庸俗可厭”。

小說作者細膩生動地描畫了女主人公思想感情的逐步变化，她那一言一行的改变，都讓人們感到合情合理，都讓人們感到親切、自然。她毅然地走上了与余永澤截然相反的道路。背道而馳，兩個人在思想上的距离愈來愈远了，矛盾愈深冲突也愈來愈激烈了。林道靜愈來愈感到：政治上有着分歧，所走的不是一条道路的“伴侶”是

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來維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擾，這只能是欺騙自己。“離開他！不能讓他毀滅我的一生”，她的決心“慢慢成熟了”。可是，當她真的和余永澤分手時，心情並不是那麼平靜的。眼前發生的一切，似乎很難使她相信似的。她反問着自己：“難道真的就和自己曾經熱愛過的男子分手了嗎？難道這個曾經度過多少甜蜜時光的小屋永遠也不能再回來了嗎？”看了看準備好分居的一切，“她的眼睛忽然潮濕了”，但是，她立刻又“為自己的徬徨、傷感感到了羞愧”，不知從哪兒來了一股力量，她拿起被卷就往外走。可是走到門邊，終究還是回過頭來，迅速地寫了一個條子，說什麼“我走了。不再回來了。你要保重！要把心胸放寬！祝你幸福！”還這樣語重心長地留給即將分手的余永澤。

作者以突出的藝術才能，刻劃了女主人公矛盾複雜的內心世界，生動地記錄下人物思想感情方面細致而又曲折的演變過程，讓年輕的、心地單純的少女的每一前進腳步，清晰地留在人們的記憶里。甚至當女主人公經過了一定的革命鍛煉，從定縣回到北京，走過那座曾經和余永澤同居的屋子門前，還“不由自主地站住”，“一種說不上來的感情，使得她對着這座小小的街門凝望起來了”，她竟“茫亂地思索起”余永澤了，“那可憐的人現在不知怎麼樣啦！他會痛苦的，他不知會怎樣想念着我呢……”可是，這一剎那的想法飄過以後，她又立刻“責備着自己”，

不應該再留戀這“死掉了的過去”！

擺脫了余永澤的羈絆，在嚴酷的现实面前，在党的直接培养下，林道靜终于健康地成長了。盧嘉川被捕以后，她冒着危險，一个人自动地偷偷地把革命傳單貼在街头巷尾，当她“貼第一張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哆嗦，腿也在發軟”，“貼了几張，胡乱地向几家住戶的門口塞了几張，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來”，可是第二天夜里，她仍然还去貼了，“而且不再像第一夜那么慌乱了”，“散發的越多，她越高兴”，“越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青年而欣喜”。当她第一次被捕时，她想到的就是“死吧——牺牲的时候到了！”第二次入獄受了重刑以后，她也这样說：“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業献出我的生命”，这样的品質确实是可貴的，然而在革命道路上，开始时她确实是很不成熟的。盧嘉川被捕以后，戴愉这样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來到她家里，沒有任何可以信任的介紹，只是听到“同志”的称呼，她便在“驚奇和欣慰”之余，一五一十地把盧嘉川最后一次見面的情况，甚至自己散發傳單的事也都談了出來。由于这，她第一次被捕了。可是，在敌人面前，她还是那么天真、幼稚，正如徐輝所批評的那樣，“对于劊子手，干嗎那么誠实？”斗争的策略她懂得太少了，散發傳單的事也都在敌人面前承認了下來。同志們的幫助与指責，立即發生了一些作用，虽然“警戒究竟抵不过她对待朋友的热情和信賴”，

但是，逃跑消息“任何人也不要叫知道”的叮囑，畢竟“發生了效力”，在戴愉面前，當戴愉別有用心地追問她“打算怎麼辦”時，她終於說出“一點辦法也沒有”的話來。當她弟弟再一次受胡夢安的指使前來軟化她時，她“沒有再向弟弟說教，也沒有大罵胡夢安”，相反地，却麻痺了敵人，在弟弟面前，“和顏悅色”地說：“如果他態度好一點，我也許……”。

血的教訓，鬥爭的鍛煉使林道靜更趨老練了。小說符合生活真實地成功地描述了女主人公的性格成長。在戴愉面前，林道靜的警惕性可增強得多了。第二次出獄以後，戴愉又想從她嘴里獲得一點什麼，當他別有用心地贊揚她“變得堅強”時，她却機警地說：“不要胡說！我剛剛放出來，像你這種說法，又該把我送進監獄了”，不但如此，而且還“當真紅着臉生起氣來”，難怪老奸巨滑的叛徒見了也“不禁露出十分驚奇的神氣”。

林道靜在鬥爭中確實鍛煉得逐漸成熟了，雖然如此，在個別地方還殘留了任性、輕率的缺點，小說讓人們清楚地看出年輕的共產黨員在前進道路上的進一步成長。在鐵路工人任玉桂父子面前，有時仍“忍不住”談論起政治，輕率地暴露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但當劉亦丰大姐嚴肅地指出她“違犯了白區工作的秘密原則”時，她就立即用“痛苦的深深自責的眼光”接受了教訓。不久，林道靜獨立擔任了黨的基層工作，在負責北大黨的工作時，雖然那

里只有三个党员，有的同学还把她当成特务，而又处在和上级久无联系的情况下，衣物快当完了，每天只吃两只烧饼，仍愉快地坚持工作，最后终于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与北大的学生党员在一起，成立了新的学生自治会，使一度死气沉沉的北大同学，走上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前列。

作者笔下的林道静确实变了，“从她坚定的步子，从她低沉的声音，以及从她那带着坚毅精神的眼睛里”，已令人感到她“已经离开了少女时代的幼稚和狂热”。怪不到徐辉感到“几个月不见，林道静可大不同了。听她的讲话，看她的姿态作风，想起她几年前在纪念‘三·一八’的广场上那种局促不安、站在人群边上连口号也不敢喊的样子”而笑了起来。林道静的思想面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这不仅使小说里的徐辉、许宁有着深深的感受，小说的读者们在具体的感人的艺术形象面前，何尝没有无限的感触。人们怀着崇敬、喜悦的感情在注视着小说女主人公的前进脚步，在注视着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党的亲切指引、关怀、教导下所跨出了的每一前进的脚步。当她在革命的烈火里锻炼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时，人们丝毫不感到突然。

小说作者以她观察生活、提炼生活细致入微的卓越才能，出色地描叙了林道静的曲折的生活道路，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性格鲜明的、光辉的典型艺术形象。

三 坚强的战士——盧嘉川与江華

在林道靜成長的道路上，給予幫助最大的要算盧嘉川与江華兩個人了。盧嘉川、江華以他們坚强的性格，以他們对党无限忠誠的一系列言行教育与影响着小說里的林道靜，也深深地感染着讀者。

小說以人物独特的共產主义風格、独特的坚貞不屈的革命意志与沉着机智的一系列言行，为祖國的文学宝庫出色地輸送了盧嘉川、江華這兩個共產主义战士的光輝形象。

盧嘉川(馮森)，这样一个小学教員的兒子，从小由于李大釗同志在他家鄉一帶活动，早就接近革命，接近李大釗同志，因而能較早地覺醒，在党的直接培养与教育下獲得健康的成長，成为坚强的共產主义战士。

人物一出場，就以“爽朗的談吐，瀟灑不羈的風姿”，給小說里的林道靜，也給讀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小說是以他回家探望母親的病体而开始人物的活动的。那时候，正是“九·一八”不幸的事变發生后的不久，在偏僻的楊庄，人們正帶着惶惶的心情在議論紛紛，盧嘉川的出現，立即以“一股魅力”“毫不費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他侃侃地談着國家大事，只是一席交談，就立即在林道靜心里放上一把愛國的憤懣之火。盧嘉川的出場不

僅使林道靜感到驚異。這一短暫的活動也給讀者們留下深刻的記憶。

小說作者接着以較多的篇幅正面地描叙盧嘉川等青年戰士們在敵人水龍頭、皮鞭、刺刀下朝氣洋溢、勇敢樂觀的戰鬥業績。江華（李孟瑜）這時也在小說里出場了，他們作為北京大學南下示威團的正副總指揮，以機智沉着、果斷勇敢的言行，鮮明具體地躍動在讀者眼前。

在南下示威的活動中，盧嘉川被國民黨的“南京衛戍司令部”扣留了起來。為了營救失去自由的戰友，南下示威團的戰友們緊緊包圍了黑暗的牢房，可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反動統治者在赤手空拳的愛國青年面前卻表現得特別“英勇”，守衛牢房的兵士們個個都“頂上子彈、拉起槍栓、插上刺刀”，“殺氣騰騰地”對付着打開一道又一道門的示威青年。漸漸，快要衝進第三道門了。一場流血的事件就要發生了。“怎麼解決這緊張、複雜而又困難的問題呢”，“讓這些青年同學流血犧牲呢？還是……”盧嘉川苦思起來了。“他極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動”、“冷靜地分析了這迫在眉睫的緊張情況”。在矛盾的尖端，作者深入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刻劃了人物的集體主義的高貴品質和當機立斷的冷靜機智的性格。盧嘉川想了又想，終於態度堅決地決定：“暫時收兵，以避免過多地流血犧牲”。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在第三道大門“發出吱呀的響聲”，“敵人的機關槍、虎視眈眈地對準了鐵門外的

学生”的时刻，盧嘉川等送出去的紙条發生了效力：示威团的同學們暫時撤走了。盧嘉川激動得“含着滿眶泪水微笑着”對同獄的戰友們說：“假如因此我們要終生住在这里面，不是也很幸福么？”這是多么高貴的品質，為了慶賀大伙兒的安全，他涌出了崇高的泪水。

人物出場不久，作者就讓人們領略了偉大戰士的寬廣胸襟。從南京示威回來以後，盧嘉川便在北平脫產做黨的工作，從此，他那“從容不迫的風度”經常出現在群眾場合的講台上。在對敵鬥爭中，他鍛煉得更機警更勇敢了，在紀念“三·一八”的群眾活動中，為了幫助同志逃脫警察的手掌，又是“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他一脚就把警察“踢出好遠”。由於他出死入生地和敵人進行着鬥爭，盧嘉川已成為敵人的眼中釘，便衣特務在到處對他進行搜捕。在北大三院的学生宿舍里，憲兵三團的忠實走狗們包圍着他，挨門挨戶地從床上床下搜尋着他，可是，又是“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他“頭上戴着小帽盔，額上蒙着一塊毛巾，身上蓋着厚厚的棉被，痛苦地呻吟着”，在二樓的工友室里，他巧妙地避開了“剿共能手”們的注意。反動爪牙們走開以後，就像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他一邊脫去工友老王的衣服，一邊却“疊好被子、掃去塵土、打開窗戶”，親熱地朝老王笑着忙着，顯得非常泰然。隔了好久，“在一個同學屋里換了一套漂亮的西裝，搖晃着身子吹着口哨”，又一次避開了敵人的耳目，走出了敵人封鎖

的地区。

小說以大量的篇幅一再地讓盧嘉川出死入生、頑強戰鬥的英雄行為生動地顯示在讀者眼前。是什麼力量鼓舞着他朝氣勃勃、渾身是勁呢？他是不是天生的神話般的英雄呢？不是的，英雄的性格不是天生的，是黨長期教育的結果，是黨給了他渾身的力量。在區委會議上，盧嘉川堅決反對戴愉的冒險盲動的錯誤主張，堅持黨在廣大群眾中應該組織抗日統一戰綫，而當自己的意見甚至遭到戴愉的無理誣蔑時，他仍舊不計較個人得失，表現了高度的組織原則。正如他對劉亦豐大姐所說的那樣，“在一個黨員熱望為黨貢獻一切的崇高理想里，就包含着不計個人的榮辱與得失在里面”。在監獄里，在敵人的酷刑下，他的雙腿被軋斷了，“只有一層薄薄的血肉模糊的肌肉連接着折斷的骨頭”，他“上肢和脊椎痛得漸漸麻木了，十個被鮮血泡起的手指頭腫得變成了大熊掌”，在這上面還緊緊銬着沉重的手銬，他是現實生活里的人，怎不知道痛苦，他痛得常常昏厥過去，嘴巴里又渴得要命，但是，“一個意念突然占據了他的心頭”，“他忘掉了難忍的渴，也忘掉了燃燒在全身的劇烈的痛楚”。“他用殘廢了的身體，用垂危的生命還組織了監獄的支部”、“組織了並且領導了監獄的絕食鬥爭”。“他懷念着、時刻懷念着教育了他、培養了他的李大釗同志。他準備着、準備着為他所景仰的事業流盡最後的一滴血”。為了監獄里的同志在自己犧牲

后不致与上级党失却联系，他挪动着自己僵硬了的躯体，“咬紧牙关把两条胳膊肘并撑在地上”，可是，“尽管痛得血和汗一齐涌流”，“身体却仍像千斤石”移动不得，“可怕的渴好像要吸尽他生命中最后一点热力”，“舔舔浮肿干燥的嘴唇，想咽一口唾沫，唾沫却一滴也没有”，怎么办？他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个人的生命，个人的一切算得什么”，“党的事业，集体的事业，还在燃烧着的斗争火焰却不能叫它停熄下去”，他打定主意，“只要有一口气，只要血管里还有一滴血在流动”，“便不应当放弃斗争——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叛逆’的身体”。于是，他鼓起劲“猛地像一条大虫似的蠕动一下，又猛地好像在一团大火当中一滚——他的身体翻转过来了，可是人又昏迷过去了”。就这样，他昏过去，醒过来，“他闭着眼睛，忍住心脏的狂跳和燃烧似的剧痛，用两只肘子挨着地，于是一下一下蠕动起来”，每到一处墙壁，“便急急地用着木棍一样粗笨不灵的手指在墙壁上敲击起来”，“寻找着他需要寻找的人”。终于在一面墙壁的一边，传过来“搭搭、搭搭”的回响，他狂喜得竟昏了过去。（他怎会料到接到联系的戴愉竟是出卖同志、出卖组织的叛徒！）这时候，“他好像一桩心事已了，肩上的千斤担子已经轻了下来”，“血似乎已经流完了最后的一滴，但是卢嘉川的脸上却浮现出一种温柔的、和谐的从未有过的幸福的微笑”，由于过度的疲劳，“他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身体一动也不能再动了”。

小說作者飽含着崇敬的激情，真實而感人地揭示了英雄的堅貞不屈、忘我鬥爭的崇高內心世界，深刻而難忘地給人們留下激動人心的記憶。對於林道靜，他何嘗不深深愛着呢？他願意和她接近，幫助她進步，可是為了不使她和余永澤之間的夫婦關係受到影響，他又避免去找她。在戴愉的眼里，在余永澤的眼里，是無法理解他們之間純潔、真摯的情感的。在與林道靜分手的當兒，在那意識到有被捕可能的時刻，英雄的內心也“交織着非常複雜的情感”，林道靜“若隱若現地流露出的對於他的愛慕，是這樣激動着他，使他很想向她說出多日來秘藏在心底的話”。但是他終於克制着自己，“拉住她的手，像個親切的長兄”。直到犧牲前夕，從監獄里寫給林道靜的信上，還這樣寫着：“可惜我們已經不能在一起工作了。在這最後的時刻，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訴你。不，還是不要說它的好。……只可惜可恨劊子手們奪去了我們的幸福，奪去了多少親人們的幸福。小林，更加努力地前進吧！更加奮發地鍛煉自己吧！更加勇敢地為我們報仇吧！永遠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不息吧！……”這是多么崇高的感情，多么純潔的感情，在犧牲前夕，還想到鼓舞別人前進……。讀到這裏，英雄的形象在人們眼前顯得多么高大、多么魁偉啊！

作者筆下的英雄戰士早已犧牲在雨花台了，然而小說却在兩百多頁以後才通過劉大姐的嘴向讀者報告了英雄的死訊，人們讀到這裏，仍遏止不住激動的感情，對偉

大的无產階級战士勾起无比的怀念。臨刑前，在給林道靜的信上，还这样寫道：“現在，我等着最后的日子，心中已然別无牽挂。因为为共產主义事業、为祖國和人类的和平幸福去死，这是我最光荣的一天。”讀着这样豪迈的語句，英雄視死如归、挺身向前的鮮明形象就像是活在人們眼前一样。作者以出色的藝術劳动为祖國的藝術画廊增添了一幅生动的成功的无產階級英雄画像。

江華(李孟瑜)，虽然与盧嘉川同样是坚强的共產主义战士，在革命隊伍里也鍛煉得机智、沉着、老練，然而与盧嘉川却有着不同的独特性格。他們的性格，同样有着明顯的軌迹逐步地展示了出來。人們从小說的人物活动里分得清江華与盧嘉川，決不僅僅是因为江華身材高大、盧嘉川的个子不高，更主要的还在于其他的方面：盧嘉川对待事物的考慮虽也細致、冷靜，然而与江華比較起來，江華更有其隱健、沉着的一面；盧嘉川在說話时虽也爽朗、热情，然而与江華比較起來，江華却更顯得醇厚、質朴；盧嘉川說話时那种一字一句慢慢的神气，还多少帶有一点儒雅的风度。作者对于江華，賦与了更多的工人階級氣質。

在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里，江華虽也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但作者在示威团活动的篇幅里，由于着力描繪了盧嘉川等人在牢獄里斗争的一面，因而江華这一人物的出場，与其說是从南下示威活动开始，还不如說是从定縣策

动保卫团武装哗变开始更确切一些。

在定縣，在林道靜的住处，江華一出場便給人一種異常穩健的深刻印象。坐在陌生的林道靜的面前，“只用銳利而和善的眼光看着道靜，好大工夫并不開口”，沉默了好大一会，第一句話便是發問：“你怎么認識徐輝的？到定縣多少日子了？”等到林道靜談了好多自己的情况，才“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徐輝的介紹信件，而且毫不拘束地直截了当地說：“你吃過飯沒有？我可沒吃飯呢。”

作者对林道靜“三步并做兩步跑了出去”“对熟朋友一样親切”“忘情地提高了尖嗓門”“喜形于色”等等一系列言行的着力描繪，与江華簡短的談吐恰巧是鮮明的对照，只是这一場面，就衬托出江華的沉着、穩健的特殊氣質。林道靜一方面在接連地倒茶，一方面还在“歪着头”像是連珠炮似的問道：“你怎么想着來定縣的呢？原來在哪兒工作？”对于这样的問題，江華可沒有立即回答什么，而扯起別的話了。江華对林道靜所在的小学的情况可問得非常仔細，“教員的思想生活情况怎么样？——好的、坏的、一般的？……学生的情况……数目，家庭成份……学生家庭生活狀況”，問得一大堆，林道靜答得不具体，心里也免不了嘀咕起來：“打听这些有什么用呀？”短短的几天接触，即虽是答不出話來弄得很窘，然而林道靜却从江華的問話里獲得很大的可貴的啓發，應該“多和劳动者接触接触，对他們柴米油鹽、帶孩子、过日子的事知道得很多，

才算具有实际精神”。由于他不断的發問，不断的分析，使林道靜在思想認識上獲得了很大的提高。

在革命隊伍里江華鍛煉得无比的机警。从定縣回到北平以后，不巧有了意外的遭遇。一个干过东北义勇軍、抗日同盟軍的叛徒孟大环纏住了他。江華“微笑着，漫不經意地”回答着對方的問話，等到叛徒明确地表明了特务的身份，还“神色自若、帶着毫不相信这是真話的神气，親昵地拍着”對方的肩膀。酒樓上逃不脫，電影院里也走不开，最后終於想起穿“过堂門”的方法甩掉了大小五个特务的包圍，气得叛徒只好“頓脚大罵”，“恨不得自己打自己几个嘴巴”。

通过一件件具体的言行，作者讓人物的精神面貌鮮明地突現了出來。江華是北大学生，可又常常自称是工人，从他身上确实可看出好多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确实具有工人与大学生的兩種身份。这不仅由于他是印刷工人的兒子，他本人从小就跟着父親当过印刷厂的学徒，在北大学習期中随着南下示威团活动以后，党又分配他到唐山煤窑里当了一年多煤礦工人。察北抗日同盟軍一成立，党又决定他做了营的軍事指揮員，抗日同盟軍失敗，便又搞起農民运动，担任了定縣的中心縣委書記，最后又搞起学联的工作。他跑过好多地方，干过好多職業，党需要他到那里就到那里，真正做到了把自己的一切献給了共產主义事業。在“一二·九”运动中，江華不幸負了伤。

隔了兩天，剛剛回到新婚的愛人身邊躺下來休息，“黃黃的沒有血色的”臉上剛剛閉起疲倦了的双眼，可是一聽到市委通訊員任老头說話的聲音，便立即驚坐起來，“一邊從容不迫地穿著棉衣”，一邊却小声地對新婚的愛人說道：“……別等我。太晚，我就不同來了。”

作者以出色的藝術成就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無數忘我的共產主義戰士的生活，為祖國的文學寶庫輸送了成功的共產主義戰士的生動而感人的藝術形象。

四 走着不同道路的知識分子形象

小說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靜這樣一個從苦悶彷徨尋求個人出路的青年終於成長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盧嘉川與江華這兩個堅強的、性格鮮明的布爾什維克光輝形象，與此同時，也成功地塑造了在白色恐怖下走着不同道路的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形象：有走向墮落道路的时代渣滓余永澤，有走着兩條不同道路的李槐英與白莉苹，有從軟弱、動搖在革命熔爐中愈煉愈堅強的許寧，有革命隊伍里的無恥叛徒戴愉等等，他們的道路不同，他們的性格都相當鮮明。這里面，小說還成功地從王鴻賓教授一家人特別是王鴻賓與王曉燕父女倆在蓬勃發展的愛國運動中所起的巨大思想變化，具體地顯示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國兩代知識分子所走過了

曲折然而畢竟是光明的道路。小說里所塑造了的一系列走着不同道路的知識分子形象，不是人們的正面教員就是人們的反面教員，對當前的讀者，都有着相當大的現實教育意義。

余永澤與林道靜雖然出身於同樣的剝削家庭，然而林道靜走的是自覺革命的康莊大道，余永澤卻鑽進了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死胡同，成為人人唾棄的時代渣滓。

在余永澤的靈魂里沒有別的存在，只有鮮明的兩個大字——“個人”。他整天想到的只是個人的“幸福”，個人的“前程”、“出路”，個人的“名譽”、“地位”……在林道靜面前張開“溫暖的臂膀”，跟在林道靜身邊“含着微笑”，“勤勤懇懇”地埋頭國故，千方百計地接近胡適“博士”，……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自己。

作者以鮮明的愛憎，懷着強烈的蔑視、鄙視感情，通過一系列具體的言行，像一把把銳利的尖刀插進了余永澤卑微的內心世界，使余永澤的狹小而醜陋的靈魂一覽無遺地披露在讀者眼前。

當林道靜走向生活的開始，在艱苦險惡的境地中受到余永澤的及時幫助甚至救了性命時，在林道靜的眼里，這位“黑黑瘦瘦”的余永澤，確實是個“善良、熱情、而且挺幹練”的有為青年，年輕的缺乏世故的少女對於余永澤“像對傳奇故事中的勇士俠客一般的信任着”，把他看作

“多情的騎士、有才學的青年”。在海邊，他們留下了好多耐人尋味的足跡。可是，這塊絢麗的雲彩只不過是一飄而過的雲彩，余永澤蒙着的一層薄薄的美麗外衣終究被狂風吹得老遠老遠，在具體的事實面前，林道靜終於“發現他原來是個並不漂亮也並不英俊的男子”，“並不像她原來所想的那麼美好”。原來這個“救人的英雄”，却是十足的怕事的“膽小鬼”，是一個“庸俗可厭”的小人，是一個“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瑣碎生活的男子”。

林道靜不斷在前進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而余永澤却在個人主義的污泥里愈陷愈深，睡不著覺，也為的是“第二篇論文”早點交給胡適“博士”，為的是“暑假後的位置會更好一點”。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余永澤的什麼“溫存多情”，什麼“超人的風度”，都在時間面前漸漸全部消失了。對於林道靜，他不是“斜過眼睛睨”著就是“陰森地冷笑”，不是“幸災樂禍”，就是“熱諷冷嘲”。最後終於免不了“緊皺眉頭，嚥聲嘆氣地”宣告“各奔前程”。“前程”確實是“各奔”了，林道靜成了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最後終於參加了“一二·九”青年愛國運動的領導工作，而余永澤卻睜著“那雙亮晶晶的小眼睛”在“欣賞著游行的行列”。投靠胡適“博士”的結果，當了個圖書館的什麼大職員，終於成了“翻臉不認人的傢伙”。

同樣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有的跑向前了，大踏步向前了，健壯地成長了；有的卻墮落下

去了，为人民所唾弃了。

小說里的李槐英、白莉苹所走的道路也是这样。

李槐英是小說里的北大“花王”，虽有正义感，也很热情，可是她一直認為“好人不党”，認為“政治就是爭名夺利的角逐場”。不幸的遭遇，嚴酷的現實終于使她轉變了過來。覺醒了以后，她是多么激动啊！她“哭着又笑着”，意味深長地說：“我做了多少年的迷夢呵！”从此，“高跟皮鞋和皮大衣”离开了她的身边，她依旧終日忙碌着，可是她前后忙着的却是具有多大懸殊的事啊！

白莉苹所走的道路可与李槐英不同，虽然很早就参加过一些進步的学生运动，当她远在吉林的家鄉被敌人占領时，她也曾在除夕晚会上激动地表示：“咱們，咱們早晚一定能打回老家”，說着說着，“想起了自己处在狼烟下的父母和故鄉，也不禁趴在床欄上哭了”。可是，不久以后，她那僅有的進取心与热情却漸漸消失了，“書也不讀了，什么集会也不参加了，只想演戲、当明星、講恋爱”。整天“眉毛描画得几乎要碰到鬢角，睜大了嫵媚的眼睛”，忙着排戲，連“三·一八”紀念游行、“五·一”游行也不参加了。最后終于嫁給影片公司的經理作第二个太太，成了“濃裝艷抹戴着珠子耳环的貴妇人”。一个曾經参加進步活动的青年变成“嘴唇塗得鮮紅”“指甲塗滿蔻丹”的醉生夢死的糊塗虫，从幻想革命“喊喊空口号”而發展到甘心

做反动階級的玩物，這實在是件可悲的事。可是，白莉苹也有她那一套“理論根據”，她說得可老實：“小布爾喬出身的知識分子，哪個沒經過這個幻想革命的時期呀，可是，後來，在事實面前，我漸漸明白啦，漸漸清醒啦——那好是好，可是看的太遠，太渺茫啦……要坐牢、要殺頭，幸而不被捕，也是什麼鐵的紀律呀，個人無條件的服從呀……”于是我回過了頭……人生不過如此，過眼雲煙，得樂且樂吧。”這便是白莉苹等人的“人生哲學”。在現實生活里確實有不少人是本着這一套“人生哲學”來生活的，當然，對於他們來說，這也算“清醒”、“明白”，只不過是與時代背道而馳；這當然也算“回頭”，只不過是“回頭”走向黑暗罷了。

小說真實而感人地通過不同人物的兩條不同道路發展趨向的展示，向讀者進行了耐人深思的教育。從作者着力描繪的形象體系里，不难看出作者的這一創作意圖。

從許寧這一個人物的生活道路看來，也富有很深的教育意義。在許寧身上，更多地具有着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些特點。他嚮往革命，但又怕艱苦危險；他既想鬥爭，但又缺乏足夠的勇氣；他願意獻身革命事業，但又留戀溫暖的家庭。他懂得不少革命的理論，能在早期的林道靜面前夸夸地大談一通，可是在尖銳的鬥爭面前，就搖擺不定了。

在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的活动中，許宁与盧嘉川一道被反动的衛戍司令部拘留起來。当示威团的同學們冲打着牢獄大門，層層深入地快要冲進第三道門、反动爪牙們正要开槍射击时，盧嘉川首先考慮到的是獄外同學們的安全，而許宁可不同了，他“用力拉着盧嘉川的臂膀”，嘴里竟胆怯地說出“也許先对監獄开槍”的話來。

在矛盾、冲突并不是那么尖銳的場合，他的拳头常常是揮了又揮，他的“漂亮的大眼睛像有火在燃燒”，他能“一下子跳到桌子旁”，搶过別人“手里的酒杯，高举到頭頂上吶喊”，在和別人爭論的場合，他能“使勁敲着桌子搶过話來”，他能“突然把拳头”向別人“跟前一伸”，他能“激忿地打斷”別人的話“晃晃自己的拳头”，“掄着拳头喊起來”。可是，真的需要他揮出拳头时，拳头便不那么容易伸出來了，比他年齡还小的崔秀玉毅然決然地参加了东北义勇軍，但是他却留恋媽媽，考慮着自己的學業。南下示威回北平以后，有許多运动他甚至連頭也不大露了。許宁的这些弱点，正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动搖的一面。

許宁这个“健壯的、面孔紅紅的漂亮小伙子”畢竟还有他好的一面。当他参加察北抗日同盟軍的那次动搖以后，曾遭到敌人的逮捕。现实生活在不断考驗着人們，在敌人的刑具下，許宁的思想向上發展了，他不但沒有絲毫退縮，而且变得更堅強了。小說末尾，人們看到的許宁，

已經不是過去的許寧，“那輕浮的軟弱的許寧已經一去不返”。出獄後他“充滿着歡樂的情緒，和一種堅韌自信的光芒”，和同志們談論着去陝北的打算。雖然他陝北沒有去成而又一次遭到敵人的逮捕，逮捕後的一切，作者並沒有花多少篇幅作正面的描述，可是他那不屈鬥爭的情景就好像展示在人們眼前似的，人們對愈來愈堅強的許寧，已經毫不动摇地產生了這樣的預感。

在革命隊伍里，有許寧這樣從軟弱、動搖到堅強的人物，也有另外一種人，在敵人的刑具面前，在艱苦的鬥爭環境下，背叛了革命，成了可恥的叛徒，甚至充當了敵人的爪牙，出賣着革命同志，破壞着革命的事業。小說以出色的藝術成就，在人們的記憶里留下了戴愉這樣一個叛徒的鮮明形象，細致入微地刻畫了無恥叛徒的卑微的內心世界，並且愛憎分明地宣告了叛徒的可恥下場。

戴愉的變節不是偶然的。人物一出場，作者就沒有放鬆對他“左”傾盲動的機會主義作無情的揭示。讀者一接觸戴愉，他那“議題還沒有討論完”便“瞅着”同志的那種“神色凜然”的態度，他那“中間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後備軍”的洋洋長篇言論便引起人們的注意。作為黨的區委領導人，不了解具體情況，也不容許別人申辯地指出一個同志“錯誤越來越嚴重”，甚至當別人發表不同意見時，竟“搖頭冷笑”、“漲紅”了臉，“幾乎要吼叫起來”。雖是初次

出場，他那“儼然教訓人与混雜着譏諷的口吻”，便使人深深感到：这样的人物与共产党人称号毫不相称。

在白色恐怖下，在敌人威脅利誘下，戴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终于变節投敌。在敌人的牢獄里，戴愉健康地活着，而当盧嘉川遍体伤痕、双腿軋断、艰难地挪动着全身寻找着同志时，戴愉竟別有用心地“热情”地探詢“和誰联系？外面的信由誰送走？”獲得了这一筆資本，投降了敌人，从此便成为敌人的親信活动在革命隊伍内部，干着殺害革命同志、破坏革命的勾当。

在同一時間、地点里，戴愉的无耻投敌与盧嘉川的堅貞不屈成了多么鮮明的对比。在共產主义战士盧嘉川的面前，戴愉的灵魂顯得多么蒼白、空虛。小說出色地勾划了戴愉在变節后的丑惡內心世界。

在王曉燕的家里，他“有时高談闊論、对答如流”，有时却非常“沉悶，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那“黑暗丑惡的灵魂在这善良而純潔的心灵面前似乎也感到一陣按捺不住的战栗。他狂吸着紙烟，几顆冷冷的汗珠滴到了曉燕柔黑的頭髮上”，他的臉色有时竟蒼白得“像一張白紙”。談情說爱，本來也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可是，对于受敌人控制的戴愉說來，却并不那么簡單，与“爱人”久不見面，竟“慢慢地似乎胆怯地走到曉燕身边，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声音低低地”說着話。在特务机关的上級面前，他“吓得不敢出声”，在他們面前，“他是卑賤的唯命是

听的奴才”，可是，見了“愛人”，却又要扮演成“沉默而持重的君子”，整天过着这样非人非鬼的生活，像“乞丐一样”進出于特务蛇窟。在那蒼白的靈魂里，也并不能說不具有內心的暫時苦悶与矛盾，有时也感到自己“真像一个失掉貞操的女人，永远只有受气”。可是，漸漸也習以为常了，鄙劣的靈魂却更加險惡、更加凶狠了。不但对于口口声声稱“老伯”的王鴻賓教授詛咒起“老滑頭”“老不死的紅鬼”，并打起“逮捕”“立功”的主意，甚至对于一貫親密相“愛”的王曉燕也動起“殺死”的念頭。只不过這“一縷冷冷的笑意”剛剛浮上了嘴角，便仰臉朝天，靜靜地躺在小巷中受着“慘淡的星星”嘲笑了。

可耻的叛徒終於獲得了應有的下場。小說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具体言行，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叛徒形象的藝術創造，給讀者留下了深刻而不愉快的記憶。

作者对于走着不同道路的知識分子着力進行了如上的描繪，塑造了不少成功的具有不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作者也集中地通过王鴻賓、王曉燕一家，特別是他們父女倆思想面貌的顯著变化，出色地顯示了“愈燒愈旺”的革命烈火所帶給兩代知識分子的巨大思想影响，从而更展示出我國進步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一幅生动的宏偉画面。

从王鴻賓教授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看來，作者認識

生活、提煉生活方面确实是具有一定才能的。在小說里，人們所看到的教授，人們所看到的這一位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充滿了生活的真實感。他那思想面貌所起的巨大變化，沒有給人絲毫的牽強、生硬、不自然的感覺。他最初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囑咐他女兒埋頭讀書，不要過問政治。表面看來，這樣的見解與胡適的“讀書救國論”沒有什麼兩樣，然而，事實上這里面却有着本質的分歧。

從小說里王曉燕的口中，人們確實了解這一位教授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教育着自己的女兒。可是，當林道靜受到特務分子的糾纏、迫害時，教授卻表露了他的正直而熱情幫助青年的可貴的一面。一聽到林道靜的不幸遭遇，教授立即壓不住胸中的怒火，“把眼鏡摘下向空中一甩，拳頭擊在桌上”，高聲喊叫起來：“豈有此理！真正豈有此理！”好容易使自己平靜下來，馬上熱情地滿有把握地說：“好吧，曉燕，別着急！叫林道靜也別着急，我們來想個好辦法。”

作者真實而感人地寫出了教授正直而熱情的言行的同時，也沒有忘了他思想深處的局限一面予以揭示。一方面，對於青年們的正義行動與不幸遭遇表示了莫大的同情與義憤，一方面，卻以另外的要求“告誡”着自己的女兒。當他妥善地安排好護送林道靜逃出北京及離開北京後的工作以後，卻又是憂慮，又是遲疑地對女兒說：“燕，

这是林道靜，我們又不容辞。可是，以后，你可再不要多管这些閑事了。这些有关政治方面的事，我們还是少管好。”

一方面同情并支持青年們的正义行动，一方面却没有也不願向前多跨一步。然而，嚴酷的現實生活不斷冲击着他，終于使他逐步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日本帝國主义就在眼前侵略着自己的國家，殘害着自己的同胞，國民党反动政府就在眼前日益腐敗，就在眼前奴顏屈膝地向敌人“奉行”不抵抗的賣國政策。在实际問題面前，他深深感到“青年們是无法关在書齋里了”，在实际問題面前，他深深感到：“國难深重，难怪——难怪人心動蕩不安”了。嚴酷的現實生活使得他对新事物產生了迫切的追求，他大量地閱讀馬克思主义書籍，在新事物面前，他变得更年青了，“斗争”的字眼，听起来再也不感到头痛了。林道靜从獄中出來，他竟“举起酒杯向道靜面前一伸，親切地笑起来”了，他不再是“从旁支持”，他嘴巴里說的是“欢迎，欢迎！欢迎从階級斗争战綫上归來的战士”，他与青年們关系更加密切了。他竟“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了，他自己說得好，他再也“耐不住一腔热血”了，“世界上有九十歲的青年，也有二十歲的老头呢”，他不再是僅僅支持別人的斗争，自己也投身于游行的行列。他把心爱的派克鋼筆、鑰匙、筆記簿等都东掏西摸地留在家裡，毅然以出而不归的决心参加了“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在游行的行列

里，他“揮着拳”“揮舞着手臂”高聲喊起口號了。在敵人的大刀和皮鞭下，他和工人群眾，他和學生們“緊緊地握着手，並擁抱在一起了”。雖然“眼鏡已經被打碎，他那肥大的棉袍也已被扯爛，滿是塵土凝集着血跡，但他仍和夫人互相緊緊地攙扶着，而且昂然大步地走在人群的前面”。

在這宏偉的藝術畫面面前，在這覺醒了的教授夫婦的巨大身影面前，有誰不深受感動呢？

王曉燕，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埋頭書案，溫文爾雅的王曉燕”了，而是一個“勇敢的、潑辣的姑娘”。在人群中，她能狠狠地揪打欺騙他的托匪分子，“一邊打，一邊憤怒地高呼”。她父親贊賞的話說得對，“鍛煉出來了”，確實是鍛煉出來了，是嚴酷的现实生活使她鍛煉出來了。

一貫沉靜的王曉燕，“從小生長在和平、溫暖的小家庭中，……溫文爾雅地只知道努力用功，希望將來也像父親一樣做個學者”，整天“莊重”而“不苟言笑”。雖然她對林道靜的熱心參加革命鬥爭“並不贊成”，特別是對於在定縣小學里反對她姑姑的事件深深引為不滿，然而在她姑姑面前，却要她姑姑“別恨她，她是個好人”。“她那善良無邪的眼睛里流露着乞求寬恕的神色”。當戴愉在她面前誣蔑林道靜是“可恥的叛徒”時，她竟在“愛人”面前“狠狠地摘下眼鏡，狠狠地擦着眼淚”，充滿自信地表示：“你是道聽塗說，她這樣的人怎麼會呢？……”可是，年輕的幼

稚的她，到底經不住戴愉那花言巧語的蒙蔽，“她被自己的愛人，也是政治上的領導者的滔滔議論和批評懾服了”。她與林道靜之間終于被戴愉所制造的牆割斷了一段時間的聯繫。

雖然如此，由于過去對林道靜的深切了解，王曉燕並沒有完全就相信戴愉所說的一切。特別是戴愉吸收她入“黨”以後，眼前發生的一切更使她的內心不能夠平靜。戴愉要她接受王忠的“領導”，可是王忠明明“不是個好人，他亂追女同學、威吓人、打人……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個共產黨員”呢？戴愉自稱是北平的“黨的領導人”，可是為什麼身上不斷的有酒氣、粉香、香水香呢？戴愉說林道靜是個“叛徒”，可是在監獄里她却為什麼那樣堅強？為什麼與她同住監獄的崔淑秀却那樣信任她呢？……類似的疑問，很長一段時間在她頭腦里存在着，常常在內心“交織着一種複雜的矛盾的感情”，特別是崔淑秀的話說得很有道理，“敵人的陰謀詭計多得很，……反動派是喜歡我們起內哄，喜歡挑撥離間我們的”。問題很明顯，“如果林道靜不是叛徒，……那麼，戴愉——她心愛的人，就是可怕的叛徒；就是一個惡毒的偽君子，甚至是比這個更可怕的人”。她愈想愈可怕，“匍伏在床上哭了”。

人物的內心矛盾發展到尖端，受騙了的善良的王曉燕，終於在鐵的事實面前，証實了戴愉是個可耻的叛徒，是反動統治者的忠實走狗。她像“瘋了一般，用簌簌發抖

的手，照着戴愉的臉頰狠狠地打着、打着，直打得自己的手都麻木了……”戴愉的花言巧語，她“再也不動心”了，天剛亮，就趕忙找到林道靜，“想說話，剛梗咽地說了一句又說不出了”。她受騙受得太痛苦了，一旦認清了真相，她再也不能平靜了。在“一二·九”運動里，她像一只年輕的勇敢的鷹在活動着，林道靜帶着病體想參加“一二·九”的示威游行，王曉燕含着眼淚說得好：“你如果覺得是損失，那，那我會加倍努力來代替你。如果我流了血，我的血里就有你的一份……”

王曉燕再也不是往日的王曉燕了，她像張開翅膀了的勇敢的鷹獻身革命了。排山倒海的人群在不斷向前，年老的王鴻賓教授夫婦也緊緊地互相攙扶着，昂然大步地走在人群的前面。小說在“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的宏偉場面里余味無窮地結束了。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在飛奔向前，一個同志倒下來，千萬個青年沖了上去，無數青年經過不同程度的曲折道路、在黨的教育與培養下健康地成長了，奮不顧身地飛躍向前了。小說通過對上述愛國青年奔向革命的热情歌頌，通過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正面描敘，真實而生動地顯示了“野火燒不盡”而且愈“燒”愈旺的我國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革命形勢。

由於小說具有如此豐富深刻的生活內容與思想內容，由於小說具有不可抗拒的藝術感染力量，因而，小說

所精心塑造了的一系列成功的典型藝術形象，小說中一系列人物所走過來的各種各樣的道路，小說中不同人物對待自己青春的态度，緊緊地吸引着人們深思。它有力地生動地告訴人們：應該學習什麼，拋棄什麼；應該如何從正面與反面的事例中汲取有益的教訓，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移動自己的腳步，如何使自己的青春發出燦爛的光輝，……這對於當前正在熱烈探求又紅又專道路的廣大知識分子說來，更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小說一出版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裡。

小說中一系列人物所走過來的各種各樣的道路，生動地鮮明地顯示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國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

自從“九·一八”的一聲炮響，不但工人、農民與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加積極地起來反對蔣介石反動集團的統治，而且，民族資產階級與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間的矛盾也漸漸地表面化起來。特別是以“一二·九”運動為開端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使全國階級關係更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上層人物，也與工人、農民站在一起，對抗日運動表示了同情，有的並參加了抗日運動的鬥爭行列；另一小部分人物在壁壘分明的情況下則愈加墮落，投入了反動陣營的懷抱。小說中王曉燕、李槐英等人經過一段曲折過程最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說中余永澤、白莉華

等人淪為時代的渣滓，都生動地顯示了這一變化。王鴻賓教授的轉變更集中地鮮明地說明了這一情況。

王鴻賓，這一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並且要自己的女兒也不要過問政治。事實上，不過問政治本身就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態度。代表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在血腥地統治着中國人民，在出賣祖國人民的利益；積極投入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鬥爭的是一種鮮明的政治態度，積極維護蔣介石反動集團統治的是另一種鮮明的政治態度，而高唱不過問政治、不過問這一鬥爭的人們態度似乎比較曖昧，似乎以第三者姿態搖擺在中間，事實上，這一政治態度也是非常鮮明的，它麻痹人民的意志，因而有利于並實際支持着反動統治集團對人民的血腥統治。在階級關係的對比上，這些社會力量實際上是倒向反動統治階級一邊的。在階級鬥爭和集中地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黨派鬥爭異常激烈的时候，像李槐英這樣的人說什麼“好人不要黨”，也就顯露了鮮明的政治態度。這種態度是有利於反動統治者的。

但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反動統治集團的一系列賣國媚敵的勾當不能不引起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內部某些人的震動。正如王鴻賓所說的那樣：“國難深重，難怪——難怪人心動蕩不安。”民族存亡關係着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中的左派跟着工農大眾

鬧起抗日救亡的鬥爭，不少“中間派”也在这項轟轟烈烈的鬥爭中捲了進來。王鴻賓教授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不僅支持別人的鬥爭，而且更以出而不歸的決心參加了“一二·一六”的示威遊行行列。可是，像余永澤这样的人，却愈來愈沉淪下去，最後終於投入反动統治階級的懷抱，成為反动統治集團中的“新生力量”。

小說歷史地真實地反映了我國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急劇動蕩社會的這一側面，雖然只集中地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的面貌與變化，但却能透過這知識分子階層的形象塑造工程，本質地揭示了整個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特別是不同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歷史動向。

五 小說的藝術特色

小說“青春之歌”所以能引人入勝地帶給人們以如此強大的思想教育力量，這是與小說的藝術成就分不開的。

從小說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看來，上述分析已充分表明：作者對於人物精神面貌的刻劃是非常細緻的，作者很善於通過富有個性特征的細節來展示不同人物的內心世界與不同時期的心理狀態。作者也善於通過不同人物對於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顯示各個人物的不同心理特征。小說在這方面的成就是比較突出的。

打開小說的第一章，人們就看到“穿着白洋布短襠

袍、白綫襪、白運動鞋”這一位“渾身上下全是白”的林道靜，攜帶了各式各樣的樂器在火車上引起同車人的驚訝、成了人們閑談資料的情景。這是一件很小的事，然而作者沒有輕易地放過一筆，而通過兩個人對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生動地顯示了一個洋學生與一個商人的不同內心世界。

洋學生和他的同伴悄悄地說：“這小密斯失戀啦？”而身旁的胖商人却熱中於另一方面，像煞有介事地在計算起這堆樂器“至少也得值個十塊二十塊洋錢”了，說着竟“湊近”了身旁的洋學生，“擠眉弄眼地瞟着樂器和女學生”，說什麼“這小妮帶點子這個干什么呀？賣唱的？……”那位洋學生“瞧不起商人”，“看了他一眼，沒有答理他”，却和別的小伙伴又議論起來了。

僅僅是簡單的這樣幾筆，就把兩個人的不同興趣，不同愛好，不同心理狀態給勾劃出來了，雖然這些都似乎是無關重要的人物，然而作者却不輕輕放過，在描述林道靜离家尋找表兄的旅途情景的同時，而緊緊地插上一筆，毫不費力地展示出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思想面貌。

那個大地主兼士紳的楊庄小學校長余敬唐，在小說里出場的機會也並不多，可是，几乎是每次出場，作者都突出地針對他那未開口先“噁、噁”以及彎腰打哈哈的庸俗世故的細節予以描繪，他那開口“鄙校”“拙號”，閉口“冒昧”“受屈”的虛偽客套，衬着滿肚子男盜女娼的鬼主

意的无情揭示，筆墨也不多，却生动而真实地勾划出他那苍白的灵魂与丑恶的嘴臉。

余永澤家里的老佃戶魏老三，在小說第十章里出場了一次，然而僅僅是這一短暫露面，作者便在顯示老佃農的質朴心胸的同時，使余永澤與林道靜兩人截然不同的內心世界更加完整、更加鮮明地展現在讀者眼前。

又冷又飢的老佃農風塵僕僕地出現在余永澤眼前時，最初是“擋住了門檻”，“沒讓他進門”，接着是“把手一揮”“讓到屋里”冷冷地朝林道靜努一努嘴，說了聲“這是家里的老佃戶”。而林道靜在同一場合對於又冷又飢的老頭兒的態度却大不相同，“連忙找個凳子讓老頭靠火爐坐下”，並且要老頭一塊兒吃飯，可是林道靜最後的“吃”字還沒有說了出來，余永澤却在一旁“使了個眼色”表示了反對。

老頭兒在林道靜熱情招呼與陪同下吃飯了，吃完飯，立即聊起了家常，可是余永澤却聽得不耐煩了。老頭兒談起自己的痛苦境遇，忍不住心酸起來。林道靜看到老頭兒用污髒的手去擦眼淚，便“趕快拿了一條毛巾遞給”老頭，可是，“沒等送到老頭手里，余永澤却輕輕奪了過去”。老頭兒想這位“余大少爺”“幫個十塊八塊的”忙，挽救他一家餓死的命運，可是，這位“大少爺”却“慷慨”地從衣袋里“掏出一張一元的鈔票放在老頭身邊”，老頭兒沒拿他那一塊錢，“顛巍巍地站了起來”，“蹣跚地向門外走”

了，余永澤見到這情景，連送也沒送老头，倒忙於“把錢又隨手掖在口袋里”。而林道靜忙着的却是“叫住了”老头，匆忙地遞給他一張十塊的鈔票，並且熱情地囑咐說：“你認識火車站么？留神！火車上有小偷，可把錢收好了。”見到老头兒感動得流下了眼淚，自己的“眼淚也忍不住流下來了”。“一霎間，她忽然想起了她那白髮蒼蒼的外祖父。窮人、佃戶，世界上有多少受苦受難的人呵！……她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門邊，看老头兒一步一回頭地慢慢走了，這才回到屋里來，可是，剛走進屋”里，一場激烈的矛盾衝突展開了，聽到余永澤說出“拿着我的錢裝好人”的這種話，林道靜再也忍不住了，“她猛地站起身來，激烈地盯着余永澤”，斬釘截鐵地說：“我，我會還你！……”。她看透了余永澤，她傷心地哭了。

讀到這裡，林道靜的身影在人們眼前似乎更高大了，余永澤那卑微的靈魂似乎已令人嗅得出刺鼻難聞的銅臭。

作者細膩地讓不同人物的一言一行，在鮮明的對比下，獲得了性格的具體展示。一句話，一個動作，孤立看來似乎無關緊要，然而，在一定場合，出自某一人物之口，集中攏來，却在揭示人物內心世界方面發生了巨大的威力。由於作者善於對人物的精神世界作如此細致入微的刻劃，因而能成功地塑造了江華、盧嘉川、林道靜、許寧、王曉燕以及戴愉、余永澤等等一系列性格鮮明的形形色

色的典型藝術形象。

小說人物形象所以能深刻難忘地在人們的腦際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是完全與作者對現實主義藝術典型化手法的熟練掌握分不開來的。

從小說“青春之歌”看來，女作家楊沫同志不僅善于通過人物的對話、人物的行動來顯示人物的不同心理活動，而且也善于把愛憎鮮明的人物肖像描繪與人物內心世界的生動揭示緊密融成一体，不僅讓讀者熟悉人物的語言，而且也熟悉人物的模樣，熟悉人物的容貌、神情、姿態，不僅讓讀者洞察人物性格的內在特征，而且從人物的外部表情讓人們更深一層地領略人物的內心世界，因而使生動具體的人物形象更能鮮明、完整地在讀者眼前突現出來。

小說在大地主兼士紳的楊庄小學校長余敬唐出場時，再三重複地對那未說話先“彎腰”以及“黃瘦的窄臉”、“眨動着眼皮”作突出的描繪，這裡的創作意圖是不難理解的。由於作者同時无情地揭示與鞭撻了他那滿腹的鬼胎，對人物的容貌、神情、姿態勾划它簡單的几筆，不僅毫不浪費，而且更能鮮明地突現人物骯髒的肺腑，更能勾起人們強烈的憎惡之感。

同樣地，作者對於戴愉這可恥的叛徒，一再地對那“飽鼓鼓的金魚眼睛”作誇張性的突出描繪，作者對於余永澤這自私、庸俗的個人主義“戰士”，也一再地對那“薄

薄的嘴唇”、“亮晶晶的小眼睛”作誇張性的突出描繪，这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毫无意义、毫无目的的筆墨玩弄。作者在人物肖像描繪中所支付的劳动，所以能加强、加深讀者对人物形象的鮮明印象，这与作者的爱憎分明，是完全分不开來的。当戴愉盛气凌人地对待別人时，当他可耻地投敌并殘害同志时，作者分明的爱憎，使他忘不了从人物的各方面(包括容貌)作加深讀者憎惡感的努力。当然，一个人在容貌上的不美并不能說明一个人在灵魂上的不美，然而当一个人的灵魂丑惡时，容貌上的缺陷，就更加令人厭惡了。“飽鼓鼓的金魚眼睛”为什么能在作者筆下發生增强憎惡感的威力，这是与小說人物的卑鄙无耻的內心世界密不可分的。当人們在小說的結尾、在宏偉的群众示威場面里，發現路旁邮局的高高台階上站着余永澤这个“看客”时，他那“欣賞”游行隊伍的“亮晶晶的小眼睛”是多么令人厭惡啊！不但是小說里的林道靜被激怒了，正直的讀者讀到这里，也怎能抑制得住內心的怒火呢？在这样的場合，作者在人物肖像方面只划上簡單的一筆，但对藝術效果的增强却起了不小的作用。

作者在人物肖像描繪方面，确实具有才能的。在小說里，作者讓人們看到的，不只是靜止的描繪，而且随着人物的思想面貌的变化，随着其他人物思想感情的演变，作者对人物的肖像描繪也跟着有了一定的变化。

同样是在余永澤的面孔上生了“亮晶晶的小眼睛”，

然而当他在个人主义泥坑里还没有愈陷愈深时，当林道静走进黑暗的社会，尚能给予某些善意的支援时，在林道静的眼里，余永泽的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当他在海边一把救起了跳海的林道静时，他那“亮晶晶的小眼睛”里闪出的却是“焦灼”的“亮光”。同样地，当作者一再地描繪林道静那“渾身上下全是白”的衣着时，与那“不爱講話、不爱笑、不爱理人”的执拗、孤独、乖僻等心境的展示是同时進行着的。人物的容貌、衣着、神情、姿态与人物的言談行动在作者筆下緊緊融成一体，为人物性格更顯明地顯示、为人物形象更突出地展現，起着相輔相成的密不可分的作用。

当然，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小說藝術情節的精心安排，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說“青春之歌”的斗争場面是热烈緊張的，整部小說的情節是曲折生动的。作者热情洋溢地以青年愛國运动为主綫，概括了当时革命斗争的各个方面，寫下了一支雄偉壯烈的革命者前扑后继的青春歌頌。表面看來，作者的筆一會兒寫到了北戴河畔沉睡的楊庄，一會兒又移向了南京的沸騰的游行示威行列；一會兒作者的筆觸在北平沙灘的公寓里描叙喧嘩的生活，一會兒在作者筆下出現的却是朴实的農村畫面……尽管作者不停地在移动他选取生活的“鏡頭”，然而，不同的場面之間却有着有機的密切联系，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綫便是在党培养教育下

的林道靜等青年的成長。因而雖然在整部小說的六十六個章節里出現了好多似乎可以自行獨立的故事，可是却絲毫沒有給人支離破碎的感覺，相反，曲折生動的情節在作者的匠心安排下，小說讓人們看到的是不可分割的藝術整體。

在這三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里，作者一共寫了近五十個人物，如何使各個人物的活動有機地聯繫起來，按照生活本身的內在邏輯，進行一系列的活動，發生一系列的矛盾、衝突，從而展開了曲折生動的藝術情節，使作品中各個組成因素獲得適當的必要的安排，使飽滿的戰鬥熱情與生活的激流有機地構成宏偉的生動的完整畫面……完美地達到這一要求，便決定於作者的洞察生活與概括生活的藝術才能，決定於作者對生活的認識，決定於作者的正確世界觀。就小說“青春之歌”的整個藝術結構看來，是達到了相當出色的成就的。當然，如果再嚴格一點要求，也還不能說已經“完美無缺”。例如，當時的整個歷史背景與小說的鬥爭畫面還不能說已經結合得很好，有時，整個的形勢發展往往只是通過江華等人的平淡講述，而沒有把當時的平津一帶的地下鬥爭、平津一帶的青年愛國運動與整個革命形勢密切聯繫起來，因此小說雖比較出色地反映了當時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的一個側面，然而對當時整個時代面貌與整個地下鬥爭的情況，反映得還不夠清晰。這不能不說是小說的主要的局限一面。另

外，小說對“一二·九”到“一二·一六”運動這一期間蓬勃發展的現實生活的描述，與其他部分比較看來，就顯得有些粗糙，人物的活動、場景的安排都缺乏足夠的感人力量，因而未能在這情節的高潮帶給人們更多更豐富的思想教育與美學享受，這也是小說的一個不小的缺陷。據作者自己說，這一段時間，作者恰好不在北京，由於缺乏親身經歷，因而，寫作起來比較困難。在為小說的這一缺陷感到惋惜的同時，卻十分清晰地令人感到：生活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多麼顯得重要。

總的來說，“青春之歌”可以毫無愧色地稱得上是一部思想水平、藝術水平都相當高的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楊沫同志經過六年這不算短的時間的辛勤勞動，出色地獲得了這一可喜的收穫。我們相信楊沫同志在已取得的初步成就的基礎上，將會更好地深入生活，更努力地創作，為祖國的文學事業不斷地作出更多更可貴的貢獻！

一九五八年“七一”前夕完稿於復旦

